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三辑

主编 ◇ 滕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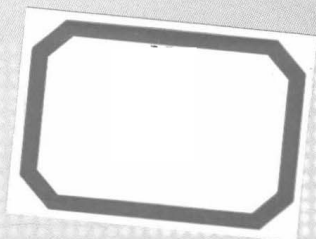
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

——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

张霜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二期重点建设项目
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基础教育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项目编号：CUN985-2-3



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

——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

张霜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7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3辑)

ISBN 978-7-105-12326-1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苗族—民族学校—中小学—教育研究—威宁县②苗族—少数民族教育—中小学教育—教育人类学—研究——威宁县 IV. ①G7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7194 号

策划编辑:虞 农

责任编辑:冯 敏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bs.com>

印 刷: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210 千字

印 张:7.625

定 价:20.00 元

ISBN 978-7-105-12326-1/G·1844(汉 87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主编序言

一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

流派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调查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似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备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

文化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仅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的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社会文化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和社会学都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但人类学却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性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

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偌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

本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劳凯声教授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

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人类学和教育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 星

2009年12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序

文化适应是国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虽然中国学者们也在积极研究文化适应在社会变迁中的特点与状态等问题，但是在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文化适应研究并不多见。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呈现出各种社会形态，以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独龙族为代表的部分民族还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社残余；在四川和云南大小凉山地区，约 100 万人口的彝族还保留着奴隶制度；约 400 万人口，主要是藏族、傣族及其他一些民族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在大多数少数民族中，包括回、壮、苗、布依、侗、水等 30 多个民族，以及蒙古、黎、彝等民族的大部分约 300 多万人口，封建地主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并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跨度之大是历史罕见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成了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文化适应的程度与结果与最后的教育成果的关系怎样？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文化适应又是怎样发生的？在国内以往的少数民族研究中，还没有学者系统地探讨过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具体的文化适应问题。张霜的这本著作以贵州石门坎这个边远、偏僻的苗族山村为案例，以文化适应为核心来

讨论文化适应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少数民族社会与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体现了她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石门坎，这个位于贵州西北部边陲，偏僻、闭塞、落后的小山村，甚至连贵州本地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地方，却由于其特殊的教育成就在海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石门坎属贵州省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端，是偏远的高寒山区。威宁是国家级贫困县，石门坎是全县公认的最贫困的区（乡），山高坡陡、气候恶劣。如果说威宁县是贵州省的边缘，那么石门坎就是边缘中的边缘。虽居边缘，石门坎却因为 100 年前基督教及基督教教育的兴起而引人瞩目，逐步走进研究者的视野。苗族，这个中国第四大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的版图上。然而，这个民族却由于支系复杂、语言多样化、居住分散而难以像其他人口众多的民族一样形成民族发展的合力。由于连年征战的历史原因，苗族一直过着不断迁徙、动荡不安的生活，整个民族社会生产力都处于较低水平阶段，民族教育基本无从谈起。然而，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一个叫“石门坎”的苗族山村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了苗族人引以为傲的“教育圣地”。

石门坎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历史上也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地方，这个边远的小山村曾经建立了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所正规的现代意义的学校，也是第一所使用双语（苗、汉）进行教学的学校。在很多年前，我就有计划做一个有关石门坎苗族的教育研究，却一直苦于没有适当的机会。也许是某种机缘巧合，我的学生张霜来自于石门坎隶属的威宁县，在 2006 年，张霜担任“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调查”中的苗文调查工作，在石门坎调查新、老苗文的使用情况达 1 月之久。在她调查时，苗族石门坎苗文及石门坎教育百年变迁，调查对象们坎坷的命运，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百年间，石门坎社区苗族教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地苗族由一个无学校、无识字人的边缘族群，

急速发展起一个具有现代教育体系和课程，培养了几十名大学生甚至博士的文化教育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石门坎教育经历了初期的平稳发展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毁；如今石门坎苗族教育远远落后于当地的其他民族。^① 石门坎苗族教育发展个案在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上是少见的，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实行民、汉双语教育的民族学校，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培养了大批苗族知识分子，它是中国民族教育成功的先例。但是，如今它却与众多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样面临许多问题，如教育落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绩不佳等。因此，可以说石门坎既是少数民族教育成功的先例，也是偏远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的一个典型缩影。石门坎特殊的教育历史促使张霜继续走进石门坎，在当地调查达半年之久，在长时间调查研究后终成此文。

石门坎苗族百年教育是一个文化变迁剧烈的过程，既取得令人瞩目的教育成就，也有低于其他族群的时期。对于石门坎，国内外研究者从宗教、族群认同等角度作过研究，但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当地苗族教育的研究还未见。石门坎是一个文化交融和文化变迁都很特别的地方，本地苗族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到如今的国家文化、西方文化，各种外来文化与当地苗族文化交会在学校这个特殊的场域的景象如何？石门坎当地的苗族人群又是如何来适应和应对外来文化的？他们的文化适应的结果又如何呢？

怎么解构石门坎百年教育的兴衰？可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解读。就张霜而言，两年多时间，3 次走进石门坎，在苗寨住了近半年，与当地苗族成了朋友的经历让她有了不同的视角，对于石门坎教育和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她有新的解释与思考。她的著作以石门坎生活的苗族同胞杨华明一家四代的教

① 威宁苗族百年实录编委会：《威宁苗族百年实录》，220 页，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育经历故事来带领大家走进石门坎，理解、探索与反思教育的意义与文化的含义，以及人在教育中的文化适应。我们总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能找到什么，能明白什么，总希望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滕 星

2011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以往研究状况	(4)
三、本书的理论视角	(17)
四、研究方法、资料来源	(19)
五、叙述方式与结构	(21)
六、研究立场、优势与局限	(22)
第二章 石门坎苗族社区概述	
——石门坎苗族人的生活世界	(24)
一、石门坎概况	(24)
二、石门坎苗族的族属、族称和分布	(28)
三、聚落类型与设施	(30)
四、传统的生产方式	(33)
五、生活习俗	(34)
六、学校教育	(39)
七、宗教与节日	(41)
第三章 石门坎苗族百年间四代人的教育故事	(45)
一、从农民到翻译家：父亲杨荣新的教育故事	(45)
二、从学生到农民：杨华明的求学故事	(69)

三、从学生到商人：儿子杨光磊的学校生涯	(77)
四、留守儿童：外孙女朱寒梅的学校生活	(95)
第四章 对石门坎苗族教育兴衰不同视角的解释	(103)
一、地方精英话语中的苗族教育	(104)
二、不同时代苗族精英的话语解释	(109)
三、学者的解释	(114)
四、地方性解释	(118)
第五章 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	(131)
一、对文化适应的解读	(133)
二、物质文化层面的适应	(138)
三、社会制度层面的适应	(145)
四、精神层面的适应	(162)
第六章 回应与对话：理论的反思	(181)
一、对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理论的回应	(181)
二、有关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的讨论	(187)
三、文化适应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的讨论	(192)
第七章 结论、问题与思考	(205)
一、本书结论	(205)
二、民族学校的校园文化与多元文化课程	(206)
三、社区、家庭与学校教育文化距离	(209)
四、关于发展苗族教育的思考	(214)
参考文献	(217)
后 记	(226)